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选编

武汉师范学院政治系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

目 录

马克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1)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4)
恩格斯:	《论权威》	(9)
恩格斯: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13)
恩格斯:	《反杜林论》(节选)	(15)

概 论

第一编 哲学

三、分类。先验主义	(26)
四、世界模式论	(34)
九、道德和法。永恒真理	(40)
十二、辩证法。量和质	(52)
十三、辩证法。否定的否定	(63)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节选)	(71)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	(75)
	辩证法》(节选)	(78)

恩格斯: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	
	终结》(节选)	(85)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	(96)	
马克思致约·魏德迈(1852年3月5日)	(109)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8年7月11日)	(111)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年4月12日)	(113)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 (1871年4月17日)	(114)
马克思致弗·波尔特 (1871年11月23日)	(115)
恩格斯致泰·库诺 (1872年1月24日)	(119)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 (1873年6月20日)	(126)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 (1890年8月5日)	(129)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 (1890年9月21—22日)	(132)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 (1890年10月27日)	(135)
恩格斯致弗·梅林 (1893年7月14日)	(142)
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 (1894年1月25日)	(148)
列宁: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节选)	(152)
第一章 经验批判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唯物	
主义的认识论 (一)	(152)
一、感觉和感觉的复合	(152)
第二章 经验批判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唯物	
主义的认识论 (二)	(156)
一、“自在之物”或切尔诺夫对恩格斯的	
驳斥	(165)
四、有没有客观真理?	(175)
五、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 或论波格丹诺	
夫所发现的恩格斯的折衷主义	(184)
六、认识论中的实践标准	(191)
列宁: 《辩证法的要素》	(198)
列宁: 《谈谈辩证法》	(200)
列宁: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	
分》	(205)
列宁: 《卡尔·马克思的学说》(节选)	(210)
列宁: 《国家与革命》(节选)	(220)

第一章	阶级社会和国家	(220)
第二章	国家与革命1848—1851年的经验	...(236)
第三章	国家与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	
	马克思的分析	(248)
第五章	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	(267)
列宁: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节选)	(286)
	五、德国共产主义“左派”。领袖、政	
	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	(286)
斯大林: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294)
斯大林:	《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	
	(节选)	(327)
	☆	☆
	☆	
毛主席:	《实践论》	
毛主席:	《矛盾论》	
毛主席: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毛主席: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毛主席: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毛主席:	《改造我们的学习》	
毛主席:	《整顿党的作风》	
毛主席: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毛主席: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毛主席:	《论持久战》能动性在战争中	
毛主席: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	
毛主席: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主席: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 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
- 毛主席：《唯心史观的破产》
-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 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 毛主席：《党内团结的辩证法》

马 克 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一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gegenständliche*〕活动。所以，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一著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所以，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

二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

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三

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例如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就是如此）。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四

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的、想象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他没有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哪。因为，世俗的基础使自己和自身分离，并使自己转入云霄，成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世俗基础本身首先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排除这种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因此，例如，自从在世俗家庭中发现了神圣家族的秘密之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受到批判，并在实践中受到革命改造。

五

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但是他

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

六

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费尔巴哈不是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所以他不得不：

（1）撇开历史的进程，独立地观察宗教感情，并假定出一种抽象的——**独立的**——人类个体；

（2）所以，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

七

所以，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

八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九

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

十

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

十一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 克 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次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第一册论述资本，其第一篇由下列各章组成：（1）商品，（2）货币或简单流通，（3）资本一般。前两章构成本分册的内容。我面前的全部材料都是专题论文，它们是在相隔很久的几个时期内写成的，目的不是为了付印，而是为了自己弄清问题，至于能否按照上述计划对它们进行系统整理，就要看环境如何了。

我把已经起草好的一篇总的导言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不过

在这里倒不妨谈一下我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

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时候、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但是同时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我倒非常乐意利用《莱茵报》发行人以为把报纸的态度放温和些就可以使那已经落在该报头上的死刑判决撤销的幻想，以便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

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他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存在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查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变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自从费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讯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钻研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八开本两厚册的原稿早已送威斯特伐里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在我们当时从这方面或那方面向公众表达我们见解的各种著作中，我只提出我与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和我自己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表述。我用德文写的关于《雇佣劳动》一书，汇集了我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上对于这个问题的讲演，这本书的印刷由于二月革命和我因此被迫离开比利时而中断。

1848年和1849年《新莱茵报》的出版以及随后发生的一些事变，打断了我的经济研究工作，到1850年我在伦敦才能重新进行这一工作。英国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

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似乎踏进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用批判的精神来透彻地研究新的材料。这些研究一部分自然要涉及到似乎完全属于本题之外的学科，在这方面不得不多少费些时间。但是使我所能够支配的时间特别受到限制的，是谋生的迫切需要。八年来，我一直为第一流英美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写作真正的报纸通讯在我只是例外），这使我的研究工作必然时时间断。然而，由于评论英国和大陆突出经济事件的论文在我的投稿中占着很大部分，我不得不去熟悉政治经济学本身范围以外的实际的细节。

我以上简短地叙述了自己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经过，这只是要证明，我持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探讨的结果。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象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卡尔·马克思

1859年1月于伦敦

恩 格 斯

论 权 威

有些社会主义者近来开始了系统性的十字军征讨，来反对他们所称为**权威原则**的东西。只要他们声明说某种行为是**有权威的**，就足以把它定罪了。这个简化的方法竟被滥用到这种地步，以致必须要较详细地来阐明问题。这里所谈的权威，是说别人的意志强迫我们接受；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但是，既然这两个用语都不好听，而他们所表现的关系又是使服从的一方感到难堪的，那末试问：是否可以不要这种关系，我们是否能够——在现代社会中现有的条件下——创出另一种社会制度来，使这个权威成为无谓的东西而归于消失呢。我们只要考察一下作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的那些经济关系、工业和农业关系，就会看到，它们具有使各个分散行动愈益为人们联合活动所代替的趋势。起而代替各个分散生产者小作坊的，出现了拥有庞大工厂的现代工业，在这种工厂中有数百个工人操纵着蒸汽发动的复杂机器；大路上的乘客马车和载重马车已被铁路上的火车代替，而小型帆船和内海帆船已被轮船代替了。甚至在农业中，也是愈益由机器和蒸汽占统治地位，虽然缓慢地但却一贯地使小自耕农被那些靠雇佣工人耕着大片土地的大资本家所代替。这样，联合的活动，互相依赖的工作过程的复杂化，正在取各个人的独立活动而代之。但是，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

来，而组织起来是否可能不要权威呢？

假定说，社会革命已把目前财富的生产和流通受其权威支配的资本家们推翻了，假定完全站在反权威主义者的立场上来说，土地和劳动工具都成了那些使用它们的工人的集体财产了。那么，权威是否就会消灭下去，还是只会改变自己的形态呢？我们来考察一下。

拿一个棉纱厂来作例。棉花至少要经过六道连续加工手续后才会成为线，并且这些加工手续大部分是在不同场所内进行的。其次，为了使机器不断转动而需要有照管蒸汽机的工程师，需要有进行日常检修的技师以及许多把生产品由一个场所运到别一个场所的工人等等。所有这些工人——男人、女人和儿童——都被迫依照那不管什么个人自治权的蒸汽权威所决定的时间来开始和停止工作。这样，工人们首先必须商定劳动时间；而劳动时间一经确定，大家就要毫无例外地一律遵行。其次，在每个厂房里，时刻都会发生关于生产方法、材料分配等局部问题，它们要求马上解决，免使全部生产工作立刻停顿下来。不论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即无论是由选出来领导各该劳动部门的人去决定，或是在可能情况下由多数表决，个别人的意志总是要表示服从，而这也就是说，问题是由权威来解决的。大工厂里自动的机器，比利用工人作工的小资本家要专制得多。至少是关于劳动时间，可以在这些工厂的大门上写出如下字样 *«Lasciate ogni autonomia voi cde entrate»*。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末自然力就对他施行报复，在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内使他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即想消灭蒸汽纺纱机而恢复手纺车。

再拿铁路来作例。这里，无数人的合作也是绝对必要的；为了避免不幸事故，这种合作必须依照准确规定的时间来实行。这里工作上的首要条件也是要有一个支配的意志来解决所属一切问题，——不管这个意志是由一个选出的人来代表，还是由一个负责执行大多数有关人们的决议的委员会来代表，都是一样。无论在前一场合或后一场合，都存在一个表显得很鲜明的权威。况且，假如铁路服务人员在乘客先生们的心目中的权威被消灭了，那末，第一趟开出的列车就会弄成什么样子呢？

但是，最显然说明需要有权威，并且是需要有最专断权威的场合，要算是在航行于汪洋大海的船上了。那里，在遇到危险的关头，要拯救大家的生命，就得全体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

如果我提出这种论据来反对那些最顽固的反权威主义者，那他们就只能给我如下的回答：“是呵！这是对的，但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我们赋予我们代表的那种权威，而是某种委托哩”。这些人以为只须改变某一事物的名称，就改变这一事物本身哩。这些深奥的思想家们，简直是开我们的玩笑。

这样，我们看到，一方面要有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造成的，另方面要有一定的服从——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组织下，都是如此，——由于赖以进行产品生产和流通的物质条件，这两者都是我们所必需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已看到，生产和流通的物质条件，不可避免地随着大工业和大农业的发展而复杂化，并且趋向于日益扩大这种权威的范围。所以，把权威原则描写成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描写成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

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因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而有所改变的。如果自治派仅仅是想说将来的社会组织只会在生产条件所必然要求的限度内允许权威存在，那也许还可以和他们说通。但他们对于一切使权威成为必要的事实都闭眼不看，却一味拼命反对名词。

为什么反权威主义者不只以叫喊反对政治权威，叫喊反对国家为限呢？所有一切社会主义者都认为，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社会革命的结果而消逝，这就是说，社会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关注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但是，反权威主义者却要求一举而把政治国家废除，即要求在那些产生出政治国家的社会关系尚未废除以前就把它废除。他们要求社会革命的第一步动作就是废除权威。

这些先生曾经见过一次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东西。革命是一部分居民用刀枪大炮，即用非常有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居民接受其意志的动作。而获得胜利的政党往往迫于必要，不得不借自己武器所给予反动派的威吓，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曾凭借武装人民的权威来反对资产阶级，那它能支持到一天以上么？反过来说，我们不是有理由因为公社把这个权威运用得太少而加以责备么？总之，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反权威主义者自己不知道自己所说的是些什么，那末他们就仅仅是散布糊涂观念；或者是他们知道这一点，那末他们就是背叛无产阶级的事业。在前后两种场合，他们都只是为反动派效劳。